

彭林  
注译

# 仪礼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K892.9  
P357(1)

1897759

K892.9  
P357(1)



国学经典

# 仪礼

彭林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18977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仪礼/彭林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11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3698 - 5

I. ①仪… II. ①彭… III. ①仪礼—中国—古代②仪礼—注释③仪礼—译文 IV. ①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915 号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30.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 - 5000 册

版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 录

士冠礼第一	17
士昏礼第二	37
士相见礼第三	62
乡饮酒礼第四	72
乡射礼第五	95
燕礼第六	150
大射仪第七	175
聘礼第八	219
公食大夫礼第九	264
覲礼第十	280
丧服第十一	289
士丧礼第十二	331
既夕礼第十三	362
士虞礼第十四	385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402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426
有司彻第十七	446

# 仪 礼



《仪礼》十七篇，是孔子删订的“六经”之一，书中记载先秦社会的冠婚丧祭等各种礼仪，为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关于礼仪制度的专书，乃中华礼学的渊藪。《仪礼》在汉初就被立于学官，对中国的学术、思想、礼制、风俗、文化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时至今日，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经典文献，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因此，读《仪礼》，对我们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 一、从“器以藏礼”到“则以观德”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有“言必称三代”之说。

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历时四百多年，司马迁《史记》有《夏本纪》一篇，寥寥数百字，粗略地勾勒了它的概貌，但是史迹邈远，今人难道其详。

商朝享祚五百多年，《殷本纪》所载，史事稍密。周人对它的追忆，文献时有所见，《礼记·表記》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崇拜鬼神，是殷人精神世界最显著的特点。19世纪末，殷墟甲骨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随后，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长达七八十年的科学发掘，规模宏大的王陵、密集的祭祀

坑、陪葬品繁多的大墓等相继被发现。在林林总总的出土物中，作为宗庙祭祀重器的青铜礼器，数量惊人，制作精美；而作为王室贵族占卜记录的甲骨，数以万计，尤其夺人眼目。《表記》说“殷人尊神”，绝非空穴来风。殷人的风气是通过礼器与祭品来表达对神明的崇拜，人本主义精神尚未出现，尚处于“器以藏礼”的时代。

殷人礼拜鬼神，虔敬而隆重，祭品极为丰厚，卜辞记载，某次祭祀先王，光是牛就用了五百头，真是骇人听闻！殷人以为，天必佑之，神必助之，因而为所欲为，腐败之极。可是上天并没有眷顾他们。武王伐纣，殷人一朝覆亡，西周王朝应运而生。殷周代谢，王权更迭，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一个理念全新的政权替代了一个腐朽的王朝，史称周革殷命，其标志则是“周公制礼作乐”。周人鉴于殷亡的教训，认识到了“天命靡常”、惟有德者有其位、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礼记·明堂位》说，周公摄政的第六年“制礼作乐”，大旨是昌明道德理性，周代社会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記》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他们果敢地从鬼神时代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迈入了民本主义的时代，这是中华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之一。

周人的典制，利用和改造了某些前代的仪式，但注入了民本主义的灵魂，同时又新创了不少富于人文内涵的新礼，两者构成了迥异于殷代的礼制体系。周礼最大的特点是，制度和礼仪——运用于社会各种层面的法则，都紧紧围绕道德教化的主旨而展开，中国文化由此臻于“则以观德”的全新时代。

## 二、《仪礼》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仪礼》的作者，古文经学家根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的记载，认定周公所制的“礼”，就是《仪礼》及《周官》等书，是周公损



益三代制度而成；他们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今文经学家认为，《仪礼》是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古代学者大多踵袭这两种说法。现在看来，两者都缺乏硬证。

周公制礼作乐，究竟制定了哪些礼？文献语焉不详，今天已经很难确指。如果没有新资料出土，我们依然只能付之阙如。不过，周代的贵胄子弟教育以礼乐作为主要内容，应该没有问题。《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可见，孔子之前就已有较为系统的礼与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正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等文献看，周代贵族经常举行各种典礼，如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仪节已经相当程式化，内容与《仪礼》所记相近，只是一直没有形诸文字。

据《礼记·杂记》载，春秋晚期有一位名叫“恤由”的人死了，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请教士丧礼如何操作，“《士丧礼》于是乎书”。也就是说，《仪礼》的《士丧礼》是在当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而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并推论《仪礼》的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今人沈文倬先生认同梁先生的说法，但认为《仪礼》的《士丧礼》，包括《丧服》、《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等四篇，它们内容贯通，属于同一个整体，著成年代大约在鲁哀公末年至鲁悼公初年，即周元王、贞定王之际；而《仪礼》全书，则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其说较为公允。

### 三、《仪礼》的名称与传本

孔子删订《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其中的《礼》就是《仪礼》。西汉犹称《礼》，如《汉书·艺文志》就称“《礼》”。汉人还有把《仪礼》称为《礼记》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此处的《礼记》，就是指《仪礼》，这可能是《仪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何休《公羊》注引用《仪礼》经文或记，则《礼》与《礼记》混称，不加区别。据清儒段玉裁考证，汉代《礼》十七篇的标题前，并没有“仪”字。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才开始有《仪礼》之名，但并没有成为通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于是成为通称，沿用至今，但《礼经》之名依然使用。《仪礼》是“经”，故学者常常称其为《礼经》，如清人凌廷堪所著《礼经释例》之“礼经”，即是指《仪礼》。《仪礼》所记内容广博，但以士的礼仪为大宗，故学者又每每名之为《士礼》。

西汉立于学官的经典讲究师承关系。“五经”之中，《仪礼》立为学官的时间相对晚一些，早期在民间的传承脉络不是特别清晰。一般认为，最初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高堂生传给萧奋，《汉书·儒林传》说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这就是所谓的《礼学》“五传弟子”。可是，《史记·儒林列传》说，在萧奋之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清楚。

宣帝时，博士后苍以《诗》、《礼》名世，《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当时《仪礼》的传本有四种，即大戴本、小戴本、庆普本和刘向《别录》本，四种传本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四类，都以《士冠礼》、《士昏礼》、《士

相见礼》三篇起首，其余各篇的顺序分歧比较大。戴德本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条大纲为序排列，《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则将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殆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的缘故。戴圣本的次序最为混乱，几乎没有条理可循。由于汉儒多认为《丧服》是子夏作，不得与正经比肩，所以排在最后。郑玄注《仪礼》，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

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四百九十六支。整理者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仅《丧服》一篇。甲本篇次与今本《仪礼》、二戴本均不同，整理者认为，当是东汉时即已失传的庆普传本。但沈文倬先生认为，庆普之学以修订汉仪为职志，是叔孙通的流亚，与高堂生、后苍等传授的《仪礼》学的性质完全不同，所以东汉《五经》十四博士中没有庆氏，武威汉简不可能是庆氏传本。

西汉立于学官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也不例外。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社会上流传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经》十七篇”，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今文经只有十七篇。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今、古文《仪礼》同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由武威简可知，汉代流传的《仪礼》经文，实际上是今古文错杂并用，并非有今文本、古文本的不同。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范围

之内，传习者日稀，后来竟至失传，故人们称之为“逸礼”。

#### 四、《仪礼》与《礼记》

礼学是礼法与礼义之学。所谓礼法，是指礼仪的程式，包括器物、服饰、宫室、人物、行礼路线等。所谓礼义，是指礼仪的人文内涵与道德指向，是制订礼仪的依据。

《仪礼》侧重于记载礼法，内容详到而细密。《礼记》是孔门七十子讨论礼学的文集，旨在阐发礼的大义妙旨，其中有若干篇与《仪礼》的相关篇章直接对应，当是经师在传授《仪礼》时所作，如《冠义》对应《士冠礼》，《昏义》对应《士昏礼》，《乡饮酒义》对应《乡饮酒礼》，《射义》对应《大射》，《燕义》对应《燕礼》，《聘义》对应《聘礼》等。此外，还有不少篇与《仪礼》有间接的对应关系，如《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篇所论，与《丧服》、《士丧礼》密切相关。《礼记》中还有许多篇章与《仪礼》没有直接关系，如《礼运》、《王制》、《月令》、《檀弓》、《乐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記》、《缁衣》、《儒行》、《大学》、《内则》、《少仪》等，是七十子后学对儒家政治理想、治国方略、典章文物、嘉言懿行，以及礼的学理、规则等的议论与发挥。《仪礼》与《礼记》的关系如此密切，两者放在一起读，才能完整把握经文的精神。

从经学的角度而言，《仪礼》是礼的本经，《礼记》属于“记”，是对经义的说解，依附于礼经而行。因此，朱熹明确提出，应该先读《仪礼》，然后再读《礼记》。朱熹的看法很有见地。

#### 五、《仪礼》的注、疏与正义

《仪礼》是用先秦的语汇撰写的，到了西汉，人们就很难读得

懂了，于是就有学者为它作注，如著名学者马融等就为《丧服》篇做过注。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郑注之中，成就最高的是他为《三礼》做的注，其中的《仪礼注》，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博综众家，兼采今古文，学界评价极高，成为《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

到了唐代，人们连汉魏人写的注也读不太懂了，迫切盼望有新注出现。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学分南北，经义说解的歧见，已经在在多有。为了繁荣与统一学术，政府任命孔颖达等学者在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基础上，为《诗》、《书》、《易》、《三礼》、《三传》等“九经”作新注。新注的性质属于“注的注”，是对经注作进一步的注解，人们称之为“疏”。今天我们常用的、由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的《九经疏》就是此时编订的。《九经疏》中的《周礼疏》和《仪礼疏》均为贾公彦所作，其《周礼疏》备受推崇，被朱熹誉为《九经疏》中最好的一种。《仪礼疏》的评价并不高，主要原因是，魏晋是门阀社会，重门第和血缘亲疏，故《丧服》研究一枝独秀，其他各篇研究者较少，故贾氏作《仪礼疏》时，《丧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准、孔伦等十几家，材料极其丰富，而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齐的黄庆、隋的李孟哲两家，详略如此悬殊，令贾氏非常无奈。尽管如此，贾疏依然多有发凡起例，多所建树，体现了唐代经学家的高超水平。

三国时，魏王肃倚仗当政的司马氏的权势，试图角逐礼学的盟主地位，肆意诋毁郑玄。然王说信徒不多，而且主要盛行于晋，持续时间较短，影响也不大。宋代学术旨趣迥异于汉代，重义理而轻考证，鄙薄郑玄之论，随处可闻，但并没有系统的诋毁郑说的著作。到了元代，敖继公承袭宋人习气，撰《仪礼集说》，指责郑注“疵多而醇少”。敖氏出于“百计求胜之心”，处处与郑玄立异。敖

氏《仪礼集说》左右学界长达几个世纪，直到清初，学界犹匍匐于敖氏的阴影之下。乾隆年间，政府设《三礼》局，修撰《三礼义疏》，其中《仪礼义疏》以敖说为指归，敖说由此登峰造极。其后，清儒吴廷华的《仪礼章句》、褚寅亮的《仪礼管见》等，开始清算敖氏谬说。学界逐渐发现，凡是郑敖相异之处，大多为郑是敖非，郑注绝不可轻诋。黄以周的《礼书通故》，评点敖说不下三百处，大多予以否定。郑玄的经师地位，虽有王肃与敖继公的挑战，但依然屹立不倒，“礼是郑学”，最终为学界所认同。<sup>①</sup>

贾疏之后的几百年，《仪礼》研究的新作为数不少，需要进一步总结，清代《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乃应运而起。胡培翬夙承家学，穷究《仪礼》，殚精竭虑四十余年，所撰《仪礼正义》四十卷，博采清人新说，申述并完善郑注，经义为之大昌。遗憾的是，此书《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等五篇尚未完竣，胡氏即撒手人寰，而由其弟子杨大培补缀而成。

## 六、《仪礼》之学的盛衰

《仪礼》与《周礼》、《礼记》并称《三礼》。《仪礼》在《三礼》中最先取得经典的地位，地位至尊，但唐代以后命途多舛。首先，《仪礼》难读，唐代古文大家韩愈就有此感叹。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考课取士。唐人按经文字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穀梁》为小经。由于《礼记》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竞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

---

<sup>①</sup> 参阅拙作：《清人对敖继公之臧否与郑玄经师地位之恢复》，载《文史》，2005年第1期（总第70期）。

《穀梁》四经文字艰深，经义晦涩，难收速效，故鲜有攻读者，这是《仪礼》之学中衰的原因之一。

其次，宋人厌恶文字训诂之学。四库馆臣说：“《仪礼》至为难读，郑注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为名物度数之学，不可空言以骋辨，故宋儒多避之不讲。”此外，时移世变，《仪礼》所记制度文物，人们已经相当陌生，复之无由，故《仪礼》不可能成为显学。

再次，遭受行政打压。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也在废罢之列。古时科举分房阅卷，自此至清，再无《仪礼》之房，研习《仪礼》者寥若晨星。

但是，有宋一代犹有值得称道的《仪礼》研究之作，如张淳的《仪礼识误》，魏了翁的《仪礼要义》，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杨复的《仪礼图》等。元、明两朝之中，《仪礼》研究之作乏善可陈。

清代《仪礼》之学复盛，名家迭出。清代礼家大多精通文字、声音、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故能深入堂奥，既能从大处着眼，也能从小处入手。清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书脱误最多，在《九经误字》中详加胪列，开清人《仪礼》校勘之先河。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为清人研究《仪礼》的开山之作。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不落窠臼，细心寻绎贯穿《仪礼》全书之“例”，总结出通例、饮食之礼、宾客之礼、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等八类，各篇的内部联系得以彰显，此书突破千年以来《仪礼》研究的形式，开创了全新的门径。《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除胡培翬《仪礼正义》之外，还有黄以周的鸿篇巨制《礼书通故》。

## 七、《仪礼》的现代价值

《仪礼》所载乃是先秦礼仪制度，是否还有价值？我们的回答

是肯定的。

首先，《仪礼》是儒家经邦治国的皇皇大典之一，也是现存年代最早的礼仪经籍。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初置五经博士，《仪礼》即居其一。唐代的“九经”，宋代的“十三经”，《仪礼》均在其中，其学术地位之重要，毋庸置疑。

《仪礼》材料来源甚古，内容可靠，涉及面广，从冠婚饗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学者研究上古社会生活、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礼仪风俗、语言语汇等，考镜源流，不能不溯源于此。

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会，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记载最为权威，是封建宗法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此书的价值无可替代，舍此无从措手。

《仪礼》所记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极其详尽，文物、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也每每要质正于《仪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作为圣人之典，始终受到尊重，多所模仿。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覲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酌加损益而成。

《仪礼》还是知识精英制定庶民礼仪的基本依据。唐宋时代，由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学走向式微，中华本位文化的主体行将被颠覆。宋代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如果传统礼仪彻底消失，则中国文化就此绝灭，故而顺应时势，以《仪礼》为本，删繁就简，取精用弘，摘取其中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加以提倡，中华文化的血脉由此得以延续。



再次，近代以来，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华传统礼仪遭受过度抨击，被全盘否定，从而出现了如下两大问题：

一是西化的趋势。人们追逐新潮，婚礼中新郎穿西服、新娘披白色婚纱，过生日唱外国歌、切蛋糕，已经成为城里人流行的时尚，大有成为国人普遍认同的仪式规范之势。

二是陋俗抬头。突出的表现是丧礼。农村的有些地方办丧事，全村人到丧家吃喝三天，贫户苦不堪言，简直死不起人，而富户则大操大办，借机摆阔斗富，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举国上下出现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势头，不少有识之士积极提倡传统礼仪，令人欣喜。但是，由于大众对《仪礼》等经典普遍陌生，故虽有作为，而往往不能得其正，仪节的设计也比较随意，也不成体系，文化品位较低。最显著的例证，是各地中学、大学流行的女青年的成年仪式，普遍使用了“笄礼”的名称，并尽可能采用古代成年礼中的文化元素。不少青年的婚礼，着力从服饰、窗花、迎亲、仪节等方面体现红火、喜庆的传统气氛，但缺乏理论纵深，令人遗憾。按照常理，一国之内，风俗可以不同，但礼必须是统一的。如今的成年礼，五花八门，有一千个单位行成年礼，就有一千种成年仪式。如果大家都读读《仪礼》，上述现象不但可以大为改观，而且能更准确地传承中华文明，这是笔者撰作此书的初衷。

《仪礼》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礼学结晶，它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更不是毫无价值的陈腐垃圾，而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此，我们应该怀有温情与敬意，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

彭林

2011年7月伏暑